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学文化源流研究专题

## 孙子的科学逻辑实用主义精神探析

徐结平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24)

**摘要:**实用主义作为哲学流派在美国发端,但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中华传统经典的实用主义思想发掘力度不够。先秦诸子中,孙子的克敌制胜思想与皮尔士基于科学逻辑的实用主义思想形成共鸣,是中国实效论的重要源头。孙子崇尚理性思维、效应为先,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相呼应;孙子决策过程包含“数据收集—最优阐释—指导行为”三步骤,与皮尔士推崇的溯因推理不谋而合。孙子是中国先秦时期最具实用主义精神的思想家之一,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实效论思想的先行者。

**关键词:**《孙子兵法》;实用主义;溯因推理;实效论;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cnki.1673-2618.2024.03.003

近代以来,孙子思想在欧美被广泛传播并备受推崇,业已成为中华经典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孙子思想被广泛应用于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技、人际相处等领域,相关研究在海内外更是汗牛充栋。《孙子兵法》之所以能跨越时间、文化与主题的隔阂,展现出恒久璀璨的思想光芒,笔者认为全书蕴含的哲学思辨是其魅力源泉。国际学界更多关注的是孙子的军事思想与具体运用,少有其哲学思想研究。国内学者对于《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编著中国哲学史时,并未论及孙子;之后,任继愈、冯友兰、郭化若、黄朴民等在不同时期肯定了孙子思想中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思维;李泽厚只言片语地肯定了孙子的实用主义色彩,其后,李零、钮先钟、安乐哲等皆有言及。较为遗憾的是,整个学界少有以孙子的实用主义精神为专题的研究论文或著作,聚焦孙

子基于科学逻辑的实用主义思想更是凤毛麟角。

美国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839—1914)是公认的实用主义哲学流派的创立者,他提出了被广泛接受的实用主义准则(Pragmatic Maxim):“任何概念的全部意义和重要性在于其可设想的实际效果”<sup>[1]145</sup>。其实效论思想特点如下:第一,崇尚科学与逻辑思维,认为真理的获取需建立在科学的方法与正确的逻辑思维之上,讲求有效数据收集与分析,最优阐释方案选择,在行动中加以检验的三步法,即溯因推理;第二,强烈的实在论倾向又使得他的理论有别于其他实用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以固执(tenacity)、轻信权威(authority)抑或先验(a priori)的方式消除疑虑与确定信念;第三,强调理性、自控力与反思精神,反对感情用事,认为一切理论决策以服务实践为目的,其效应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皮尔士基于科学逻辑的实用主义思想与在战争

收稿日期:2023-12-27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海外传播与国际形象构建研究”(2023AH052081);巢湖学院校级一流课程“商务英语听说”(chylkc049)

作者简介:徐结平(1982—),男,安徽安庆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符号学与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E-mail: xujieping1020@163.com

场域中孙子对将帅的要求与战场行为决策的制定过程不谋而合。如在面对竞争时,讲究“上下同欲者胜”,“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做决策时,“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的实用主义精神是其思想广泛适用性、强大实用能力与持久魅力的背后缘由。隐藏在孙子兵法中的实用主义精神是支撑孙子恒久魅力的哲学根基。

### 一、理性思维——决策者必备素质

皮尔士的逻辑实用主义思想注重行为者的理性思维。“从学理上讲,实用主义以目的论为基础,因为实用只能是相对于目的而言的,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实用。”<sup>[2]</sup>行动的目的性与有效性决定了实用主义者必须具有理性的反思精神与行为上的自控力。

孙子注重理性思维,首先体现在他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全书不乏对战争破坏性的反思。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在《作战篇》中论述战前准备时,反复告诫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以及久战的危害,“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并做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判断。其次,孙子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应该坚持“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原则,即一切行为应该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除非能获得实在的利益,具有取胜的把握或事关存亡威胁,绝不会轻易言战。孙子言“兵以诈立,以利动”,战术讲究诡诈欺瞒,是进是退,是战是和,以能否获利为基本考量。最后,战争开始前,孙子告诫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大权在握的人面对可能的战争,尤其要管控个人情感,失去理智时而做出的决策可能会导致万劫不复的后果。在战争中,将帅也要切记摆平心态,决不能急于求成而置将士性命于不顾。“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孙子将攻城的残酷性暴露无遗的同时,认为将领在作战时,即便没能达到预想攻城效果,也不能愤恨恼怒而致将士的性命于不顾,视士兵如蝼蚁,巨大的伤亡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

在孙子看来,将帅时刻需要谨记“怒”“愠”

“忿”等情绪会带来伤害,时刻提防固执、偏激与感情用事。在战场上,能保持沉静而深邃、公正而严整的工作作风是将帅的必备素质,正所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决策的制定,必须剔除个人爱憎、利益与压力。秉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行为法则,提高对自我的约束与反思能力,剔除一切不利于战事走向的个人因素。即便是平时被广为称道的优秀品格,只要不利于取胜,便为潜在危险。孙子说,将有五危,必死、必生、忿速、廉洁与爱民。在一般场域,这些品质大多令人称颂,可在战争中,如果一味地拼命,轻言生死;一味求生,疑怯不前;刚忿偏激,逞怒轻战;过于爱护名节,一味宽仁,反而成为将帅容易被人操控的弱点,招致祸害。因此,张预注曰:“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智者则不然,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也”<sup>[3]178</sup>。

孙子的清醒还表现在对权力的态度与确定战略的方法中,如同皮尔士反对以权威法确定信念,《孙子兵法》全书以孙子与吴王的对话为口吻,在《计篇》结尾便表明心迹,“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在事关生死战事决策上,孙子从不向权力低头,在全书中一再强调将领在战场上的绝对决策权,讲究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面对来自君王干预决策,孙子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不论权势,只论实际效应;不计个人进退得失,只论国家与人民的集体利益。“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为将者首先要遵从的不是王权,而是战场的客观现实。孙子甚至警告君王需警惕“乱军”的三种行为并言明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因此,孙子总结道,由于战场情形瞬息万变,在必要的情况下,将帅要有“君命有所不受”的勇气,同时建言君主要做的是“上下同”且“君不御”,警告统治者须做到行为自控。

面对战争抉择,孙子以极端冷静的心态计算

战争成本、胜败概率与攻守兵力的配备。要想克敌制胜,首先,在经济上,孙子计算了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消耗。“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从人力、物力与财力三个方面计算了战争对一国物质条件的依赖关系,做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论断,并结合当时诸侯并起与残酷的兼并战争,提出了“兵闻拙速,未睹巧久”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史上案例一再表明劳师远征久战不决的危害。“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橧辘轳,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如果后方空虚,则后患无穷,“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的冷静思维事实上预言了他所辅佐的吴国的日后灭国命运。

## 二、行为效应——孙子谋略基石

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三元(实在—概念—效应)中,客观实在是一切认知的前提,效应是检验概念真值的唯一标准,故实效论实则是关于行动的哲学,是事关未来的学问。孙子认为,战场上的一切谋略、决策、计划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并在实践进展中检验成色。孙子的教义不仅是对过去战场行为的一般性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关于探索未知、揭示真相、启迪未来的指导书。

一般读者多惊叹于孙子谋略,不乏将《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等同视之的。“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儿读……这是现在的风气。”<sup>[4]35</sup>即便在海外,《孙子兵法》的谋略,特别是诡道思想历来备受瞩目。事实上,《孙子兵法》原文从未过分夸大谋略的真实效应,相反,孙子是坚定的实在论者,一切谋略须以客观现实为前提,脱离事实的主观意愿只能适得其反。为将者首先需把握强弱的事实,制定相宜的攻守策略。“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不然则容易造成“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的后果,故孙子承认,“胜可知,而不可为”。决策者只能尽量营造“先为不可胜”的条件,立于不败之地;至于战胜敌人,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而需要等待合适战机,等待敌人犯错,故“不可胜

在己,可胜在敌”。

战与不战也绝非决策者的一厢情愿,如上所述,孙子历来反对偏执与感情用事,决策者须拥有统筹全局的胸襟。孙子秉持综合国力对于战争走势的决定性作用。“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军事上的对抗需要客观经济基础与综合国力做后盾。战争双方比拼的看似是将士的勇猛与主帅的临场指挥能力,事实上,综合实力才是胜败的决定因素。在孙子看来,所谓的善战大多是“胜于易胜者”,实力的差距促成了最终的战场走势,故胜者“无智名,无勇功”。孙子想告诉世人的是,走向战争的第一步,是如实了解双方的客观实力,尊重客观实在,即做到“知彼知己”与“知天知地”。

孙子对客观实在的尊重还体现在战前的军事准备。战前需对自己、敌方、战地、天时等做出详尽调查和比对研究。必须指出的是,其一,知彼远比知己、知天、知地困难,敌对双方大多会将本方实力、意图、计划视为高度机密;其二,战前的战略战术需要在实际对抗中检验成效,再周密的方略也可能跟不上千变万化的战时事态发展。因此,对于了解敌情与战事变化,孙子秉持的原则是“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变幻不居是事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故孙子同时重视战时的敌情收集工作,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从战前的筹划谋算,到战场上的斥候谍报与示形,乃至与敌方做出试探性的接触,都是摸清敌方实力的有效之举。

尊重事实、遵循战场规律是制定一切战略战术的前提,但仅是如此不足以确保战略战术的有效性。孙子思想中还蕴含了对人性的认知与运用,这也是其思想广泛适用性的重要原因。对待敌人,孙子能根据人性弱点,从容制定对策,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目的。孙子认为,对待唯利是图的敌人,要“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对待诸侯,“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对待己方士兵,“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孙子的策略无一例外地运用了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将利害关系作为操控对手、旁观者乃至自己

人的有效手段。如果战争本质是为了逐利,则可以制造利的假象,诱惑敌人朝自己设计的圈套进发。但战争并非仅关乎敌我两方,同时需注意列国的动向,以免造成“诸侯乘其弊而起”的窘境。为避免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窘境,孙子制定了不让旁观者加入敌方阵营的策略,即用“害”使他们屈服,用“事”驱动他们,使其疲于应付;用利去引诱他们,使他们为“我”奔走,不但如此,孙子认为,利害关系同样适用于极端情形下的士气管理。当士兵陷入亡地或死地,用潜在的危害来约束他们,使士卒无幸生之心,除非死战则无以存活,以激发士兵的全部潜能。

为实现克敌制胜,孙子摒弃了春秋时期流行的军礼,“兵以诈立”是孙子对当时战争形态做出的全新判断。春秋前期墨守的军礼如“不击半渡”“不擒二毛”“君子不重伤”“不鼓不成列”等被孙子遗弃,他讲,“令半渡而击之利”,“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究其缘由,战场上敌对双方的互动行为并非建立在常态社会的信任之上,这意味着在战争场域,常态社会伦理道德中的许多条条框框不再具有束缚作用。即便是针对自己人,有时为了最终结果,孙子都能将之作为战术的牺牲品,“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子的这些思想都是从战争实际出发,为了最终的目的,无论是谁,隐瞒、欺骗、舍弃都在所不惜。这种极端功利性在揭示战争残酷性的同时,也终于撕掉了常态社会场域中温情脉脉的仁义外衣。这种“可怕”的冷静与理性割裂了的一切个人情愫,所有计划、策略只服务于实践,效忠于克敌制胜的行为目的。

### 三、克敌制胜——孙子谋略目标

实用主义思想家认为,一切思想起于感知,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现实感知是思想观念的前提与基础,回归并指导实践是思想观念的目的所在。对于孙子而言,克敌制胜无疑是一切计划、策略、战略、战术的最终目标。可贵的是,孙子反对过度暴力与嗜血好杀,认为毁灭对方并非战争追求,以非暴力手段令敌人屈服才是孙子的理想追求。他将对敌行为优劣排序,“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把以计谋与外交手段挫败敌人放在兵戎

相见与攻伐之前,说明孙子强烈的反暴力倾向。事实上,孙子的暴力观为“非危不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攻城略地带来的巨大伤亡,讲求以较小的代价来谋求更大的利益。故以暴力胜了对方,非高明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他甚至提出“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用兵之法。孙子的行为准则从来不是杀人盈野或毁灭对方。当然,此三句也常被解读为避免让敌人做困兽之斗而导致过大伤亡。无论何解,它都能体现出孙子反对过度杀戮与战争伤亡的思想主张。

争胜是《孙子兵法》全书的焦点,6000余字中“胜”出现了83次。孙子指出了各种制胜的要素,认为将帅只要根据自己具备的客观条件,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选择,就能预知能否取胜这一结果,即“知胜”思想。取胜条件包括战前计划、正确处理统治者与将帅关系、情报收集、战术选择、潜能调动等,涵盖了经济、政治、管理、心理等方面知识的运用。孙子认为,在战前准备上,“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在政治建设上,“上下同欲者胜”,要求统治者“修道而保法”,实现“民与上同意也”;在情报收集上,明言间谍的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知敌之情者也”;在军队管理上,要“知吾卒之可以击”;在战术上“以正合,以奇胜”,“知迂直之计者胜”;在陷入困境,凸显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即如何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全部潜能,从而化害为利,转败为胜。

攻守策略选择是争胜的关键。孙子建议:“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何以判定能胜负?孙子有一个简化的算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问题在于人数并非左右战争走势的唯一动因,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却是不争的有效方法,即“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同时,在总兵力不变的情况下,敌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也是选择进攻方位的重要标尺,即常被世人引用的孙子名言“避实就虚”,从而达到孙子所期望的“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 四、溯因推理——孙子思维精髓

李泽厚曾说,孙子遵循的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sup>[5]</sup>,是寻求既定事实的可能性解释的推理过程,本质上是猜测。这种推理,查阅、关注、消化事实是前提,科学思维是关键,形成一般性概念或理论是目的,即溯因推理。它被界定为是创造性生成最佳解释方案的思维模式<sup>[6-7]</sup>,是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与科学思维中被反复应用的一种推理模式。

##### (一)孙子的逻辑推理过程

溯因推理包含三个阶段,以特定情境中可观测结果或事实为前提,根据给定案例中已知证据寻求各种可能性的解释,最终选择“最佳”解释项并在实践中检验效应。此三步骤需考虑:数据的可靠性与实际的成本与收益。孙子思想的精髓之处在于教会人们针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如何借用科学的思维,形成合理的一般性的概念,在解释既定事实的同时,预见未来发展。“孙武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对现实所采取的科学途径。他的书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最早提倡对于社会现象采取科学分析方法的”。<sup>[8]</sup>孙子严格遵循了溯因推理步骤,每一项决策做出前,要求决策者通过收集敌我双方的有效数据。在开篇的“五事七计”中包含了战前与战时的政治环境、客观外在环境、军力等数据作为决策的重要考量,他认为这些是最重要因素。他问决策者“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特别是对于敌方数据,孙子主张全方位、多时段、多渠道地加以获取。在战场上,有效情报涵盖了敌方决策层、普通士兵乃至第三方。对于敌方将领,可收集其个性特点,如上文所述的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等并加以利用,也包括他“谆谆翕翕,徐与人言”以及反常的“数赏”“数罚”。对于诸侯列国,“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也包括收集敌方士兵的具体行为数据,如“杖而立”“汲而先饮”“见利而不进”“夜呼”等;甚至包括战场上的鸟飞兽骇、尘土飞扬。数据的收集既包含战前的庙算,“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也涵盖战时的交锋,包括“策之、作之、形

之、角之”等直接对抗的方式,获取战时敌方信息。在获取渠道上,包含冷兵器时代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所能感知的各类信息,也包括斥候、使者,尤其是间谍的使用,他认为,五间俱起是收集敌方决策层(内间、反间)与下层(乡间)的情报信息。

收集到数据后,下一步就是对已知数据进行解释。孙子对于已知数据的解释都是本着实用原则,即从胜负成败的旨归解释摆在眼前的一切。面对天、地、山、川、丛林、飞扬的尘土、鸟、兽、水、火等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孙子从它们影响战斗局势走向的功利视角加以解读,讲求发挥自然世界的积极作用,避免所谓的“天地之灾”。例如,孙子的“天”不是那个时代信奉的“天命”,而是“阴阳、寒暑、时制”,即阴晴、冷暖等天气因素。如在《火攻篇》中,孙子强调天时的重要性,认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孙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倡导“地利”的思想家之一,认为“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地”即非被动,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与人的互动中发挥着重大战局影响的存在,如生地与死地。如当判定为死地时,“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故在不同的地形,要采用相应的战法,激发人的战斗潜力。同时,孙子对待自然符号剔除了一成不变的僵化视角,讲究审时度势地加以阐释。如他对水的态度,认为“以水佐攻者强”,却在某些特定情形下须“远水”,同时崇尚“兵形象水”。

对于事关敌情的数据,多渠道全方位地获取后,势必造成海量信息不绝于耳。如何提取有用的信息并谨防上当受骗呢?孙子有两条建议。其一,辩证地看待一切行为背后的利害关系。基于对于战争的清醒认知,争利是一切战争的触发原因,避害是所有战略战术的底线,“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在做出决策之前,事先预计可能带来的利害得失,可能的益处、消耗与潜在的风险都是决策者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须杜绝以不计成本地消耗自己为代价去战胜敌人。“胜敌而益强”才是可取之道。除此之外,决策者应具有调换角色的能力,即能站在己方与敌方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能力,这要求换位到对方的视角考量对

方的行为,乃至以对手的视角观照自己。《孙子兵法》全文中事关决策的做出,决策者常常做出这种角色的置换。例如,在陷入死地时,决策者先具备与本方士兵的共情能力,才能激发他们的战斗潜力,先站在士兵的立场,先了解“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才能发挥他们的诸、刳之勇也。虽未明言,但在《虚实篇》中,避实就虚的前提就是角色调换,站在敌方视角,更易于推断敌方的兵力部署、行动目的。“出其必趋”,即要攻击的方向应该是敌人必定要去的地方,同理,“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只有从敌人的视角,料定其疏于防守与进攻的地方,才能实现我实敌虚。其二,剔除个人主观情感左右,客观冷静地面对一切讯息,以一种简化的二分法,迅速而明确地抓住要害并做出抉择。以胜负作为一切讯息阐释的旨归,舍弃无关乃至次要的信息,避开烦琐的细节,以生死、攻守、分合、虚实、奇正、勇怯等对立项抓住事物的本质,并迅速采取行动。

## (二) 孙子思想应用误区

明人茅元仪总结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阐明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兵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在海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用孙子思想解释美国越战失利;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孙子兵法》远胜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成为美国军事院校的必读书目;日本人最早将《孙子兵法》应用于商场竞争与企业管理,开启了孙子思想在非军事领域现代应用的先河。但孙子思想在具体应用中也存在教条化和应用边界的问题。

上文已论述,孙子思想中一条重要的思维逻辑为溯因推理,即依据事实寻求最佳阐释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行动方案。然而,历史上许多孙子的读者在行动抉择时,将兵法教条片段化、教条化,忽略孙子决策中遵循的“数据收集—最优阐释—指导行为”的过程。从《史记》记载中韩信“背水一战”的全过程就会发现,韩信、汉军部将与赵国主帅都不约而同地运用到孙子思想,却完全呈现出不同的格局。赵强汉弱,身为强者主帅陈馥遵循的是“十则围之,倍则战”,耻于诡道诈术;汉军部将则坚持“右倍山陵,前左水泽”

的布阵,既能阻挠敌军的进军速度,又可以借助高地取得优势;韩信则是运用“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策略。韩信与他们对《孙子兵法》理解的不同点在于,韩信遵循的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其他人则是将兵法中部分战术照搬到现实战场。韩信的战术应用是建立在敌强我弱的现实与熟知具体地形的基础上,注重战前的情报收集,“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sup>[9]</sup>。他战前做到了知彼知己、知天知地;战时则进一步强化敌方轻视自己的倾向,处处从对方视角行事,投其所好,通过背水阵与建大将旗鼓成功巩固敌人对己方力量弱小且毫无战斗经验判断的同时,又实现“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再以两千精锐骑兵绕道敌人后方,正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相反,其他人只会套用孙子教义的只言片语,忽略对己方士兵战力的基本了解,或为名节所累,不屑“诈谋奇计”,说明未得孙子精义。

因此,一切战略战术的制定须建立在对现实情形掌握的基础上,照搬照抄前人的只言片语有害无益。孙子讲:“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成功的事实显而易见,背后的道理才是关键所在。重复前人的战法并不可取,要加强应变能力,根据不同的事实情况制定相宜的战略战术。后人在阅读《孙子兵法》时,应认识到孙子的决策思维过程,即从事实出发,以利害关系、胜负旨归做出阐释,形成行动方略,接受事实检验的过程,这也是溯因推理的过程。基于溯因推理所做出的战略战术判断,随着客观现实情境的变化,难免出现水土不服或甚至错误,这也促成了后世伟大的军事家能适时突破孙子的教义。孙子在春秋晚期列国纷争的时代断言“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则依据日中两国现实作《论持久战》坚定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孙子的“穷寇勿追”具有其合理性,毛泽东则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

溯因推理的思维形式也决定了孙子思想的广泛适用能力。许多人将孙子的治军思想移植到现代企业管理中,甚至是竞技体育中都能运用孙子思想,似乎所有存在竞争的行业都可以从孙子那里获得一定的养分。但钮先钟认为:“这些

作者似乎并不了解《孙子》有完整的思想体系,于是《孙子》也受到‘五马分尸’的悲惨命运。这样的书对于孙子和企管两方面的研究都不算适当。”<sup>[10]</sup>李零言辞犀利地批评说:“《孙子》的应用研究,就是要把《孙子》搞成关公文化……我劝大家,别拿它(孙子)当狗皮膏药、万金油。”<sup>[4]</sup>

无可否认,这些行业内存在的竞争与战场具有相似性,俗语云“商场如战场”,且孙子倡导的知彼知己,脚踏实地、周密企划与大战略,管理上追求团结一心、赏罚分明,对于未来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等思想的确对于现代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我们更要防止将孙子事关“生死存亡之道”全盘移植到常态社会中一切存在竞争的场域,毕竟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应该建立在道德与法治之上。竞争的有限性、对互利合作共

#### 参考文献:

- [1] PEIRCE C. The Essential Peirce; 2[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陈晓平. 自然主义与目的论: 兼评蒯因的本体论[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6): 42-48.
- [3] 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4] 李零. 兵以诈立: 我读《孙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6] JOSEPHSON R, JOSEPHSON G. Abductive Inference; Computation, Philosophy, Technology[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7] WALTON D. Abductive, presumptive and plausible arguments[J]. Informal Logic, 2001(21): 141-169.
- [8] GAWLIKOWSKI K. Sun Wu 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raxiology, Theory of Struggle and Science[J]. Hemispheres, 1994(9): 9-22.
- [9] 司马迁. 史记[M]. 韩兆琦,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0] 钮先钟. 孙子三论[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A Discussion on The Spirit of Sun Tzu's Scientific Logical Pragmatism

XU Jie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24, China)

**Abstract:** Pragmatism as a philosophical school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pragmatic thought has a long history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insufficient exploration of pragmatic idea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lassics. Among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the thoughts of Sun Tzu on defeating enemies and winning resonated with Peirce's pragmatic principles based on scientific logical thinking, which can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theory of actual effect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Sun Tzu's emphasis on rational thinking and prioritizing effect reflects Peirce's maxim of pragmatism. Sun Tzu'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collecting data, optimal interpretation, and guiding behavior aligns with Peirce's abduction. Therefore, Sun Tzu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pragmatic thinkers in ancient China and a precursor to pragmatic though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ven the world.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Pragmatism; abduction; the theory of actual effect; scientific method

(责任编辑: 许 金)